

龙龕手鑑四卷

(辽)释行均撰 宋刻本(卷三配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)。框高26厘米,宽18.7厘米。每半叶十行,行大小字不等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行均籍里不详,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,行均是辽代僧人,俗姓于,字广济,北地人,博学多闻,淹贯经论,能诗文。尤精于文字音韵,士夫多就之学。也记载说他是幽州(今北京)僧人,实则就是活动于今河北、山东、北京一带的比丘。此地时为契丹人的辽国所管辖,故可称为辽释行均。

宋苏辙《栾城集》卷四十一《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》称:“北朝皇帝好佛法,能自讲其书。每夏季,则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,执经亲讲。所在修盖寺院,度僧甚众。因此僧徒纵恣,放债营利,侵夺小民,民甚苦之。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,杀心稍悛。此盖北界之蠹,而中朝之利也。”这可以说是行均编撰《龙龕手鑑》的社会大背景。

自六朝迄于唐五代,汉字中的俗字极为盛行,今所见敦煌写经中的俗字就很多。这些俗写字、异体字,偏旁无定,繁简无定,字形无定,使得识字、读音、检索、解义均极困难。正如辽统和十五年(997)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为《龙龕手鑑》作序中所说,当时佛经“流传岁久,抄写时讹,寡闻则莫晓是非,博古则徒怀惋叹,不为敏达,谁为编修”!行均便是在这种情况下,决心编纂《龙龕手鑑》的。《龙龕手鑑》中辑录了大量的俗体字和异体字,并依照写本经卷中所收俗字、异体的偏旁归部,而在每字下均详列正体、俗体、古体、今字以及或体,并作简要的音义注释。部首及各部所收之字,均按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为序排列。此书一经问世,使北地人诵念和研读佛经“无劳避席,坐奉师资,诘假担簦,立祛疑滞”。但至于清末,李慈铭不深悉行均编纂的用意,却妄斥其“部居误偏旁”,“俗谬怪妄”,“直是废书,不可用也”,实足为天下笑。

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五说:“契丹书禁甚严,传入中国者,法皆死。熙宁中,有人自虏中得之,入傅钦之家。蒲传正帅浙西,取以镂板。”按,蒲传正,名宗孟,传正是其字,阆州新井(今四川南部)人。北宋皇祐进士,调夔州观察推官。熙宁元年(1068)改著作佐郎。召试学士院,为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,进集贤校理,同修起居注,迁直舍人院知制诰,同修两朝国史,进翰林学士兼侍读,拜尚书左丞。宋神宗尝以无人才为叹,蒲传正率尔对曰:‘人才半为司马光邪说所坏。’帝不悦,罢知亳、杭、郾三州。沈括所谓“蒲传正帅浙西”,盖指此事,时在元丰八年(1085)至元祐二年(1087)之间,故《龙龕手鑑》的第一个刻本,即是蒲传正的浙西刻本。《龙龕手鑑》原名《龙龕手鏡》,传入宋土再刻时要回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嫌名讳,故改“鏡”为“鑑”。此书当时也传入高丽,高丽

亦予重刻，仍称《龙龕手鏡》，一九八五年中华书局曾据高丽本整理影印。

此本为皮纸印造，字体颇类《九成宫》，欧字风韵甚浓，整体风格似为浙江地区刻本。版心上镌大小字数，下镌刻工姓名。其刻工可检识者有张刊、澄刁、金良、何全、郑林、范子荣、李生、林茂、林盛、徐永、朱祥、沈绍、朱礼、胡杏、王成、王因、陈乙等。考徐永、王成、王因、何全都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刻工，其中二王与何全在绍兴九年（1139）参与过临安府主刻《文粹》。王成在绍兴间为严州刻过《艺文类聚》。林茂在绍兴初期参与过《三国志·吴志》的补板工作，还参与刻过鹄山书院本《资治通鉴》。林盛则参与刻过《切韵指掌图》。这批刻工的出现，表明《龙龕手鑑》当亦刻于南宋初年的杭州地区。

此本明末清初是毛氏汲古阁的插架之物，钤有“汲古阁”、“子晋”、“毛氏子晋”、“汲古主人”等印记。当时卷三便已残缺，汲古阁曾据另一宋本影抄补配。至嘉庆时，此本又为汪士钟所藏，钤有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闾源真赏”等印记可证。民国时此书归祁阳陈澄中。今则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（李致忠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